

新书聚焦

解读经济学作品，大致有三个维度：历史、逻辑和数据。

《货币崛起》这本著作，就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从历史的角度去解读货币的成果。目前次贷危机阴影尚未消褪，许多读者认为，货币崩溃、华尔街败局、金融赌局之类更能反映当下情形，而《货币崛起》多少显得有些另类。

对于货币，有的说“货币天然不是金银，金银天然不是货币”，有的说“货币就是货币的职能”，凡此种种。《货币崛起》给予我们一个隐含的答案：货币是基于国家能力的信用竞争选择。

弗格森乐观地认为，美国和中国在未来全球货币崛起时代有很重要地位，G7代表性不足，G20说多做少还不是主角，作为G2的“中美元”可能登堂入室。这样的陈述令人激动，但现实的中国仍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，还有大量社会经济问题亟待解决，从金融和经济规模上看，中国赶上日本还有待时日，更遑论美国！

《货币崛起》给我们一个清晰的结论，回到金本位或者商品本位是困难的，未来的货币崛起，是一场大国实力竞争在全球或者区域的表层浮现。货币的地位是海面上的冰山，而国家能力则坚硬地在海面之下沉默着。

——钟伟

吃饭一旦变成了饭局，就远不仅仅只是饮食了。

作家高和的长篇新作《中国式饭局》，便是围绕着饭局展示了不同阶层人物的各不相同的命运。书中的人物有狡黠的商人、高傲贪婪的官员、性感善良的擦鞋女、道貌岸然的作家等。作者以自己敏锐的观察，把这些人物描绘得活灵活现。

饭局离不开饭，但真正的意味又不在于“饭”而在于局。是局，就难逃设局、操局、结局这三部曲。中国历史上，饮食文化与社会政治纠结在一起，算得上是一大奇观。史书中那场有名的鸿门宴的结局，甚至改变了历史。南唐后主李煜猜忌重臣韩熙载，偷偷找画工描绘其家中的饭局情形，没成想留下了一幅传世名画。《中国式饭局》承载了众多人物起伏跌宕的命运，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缩影。

——窦海军

《廉价哲学》是洪晃的个人文集。哲学？廉价？其实就是消费主义背景下的思考。

洪晃的文字洒脱，明显是高端的，她认识的社会名流不计其数，她的身价也在朋友的影响下抬升了。

洪晃的好玩在于她是文化基因铸成的商人，趋利避害是商人的本性，文化人的本性则是独立思考 and 独立发声。虽然她的想法有时过于细节和局部，却像包裹着品牌的风衣让你很难以一眼看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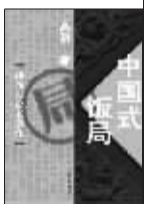
她大大咧咧的被低调的人拒绝，她开心地刘索拉说话时作鬼脸，她尽责的当潘石屹的顾问，在《亮话》里，她依旧年轻。

——飘浮者 (魏辑)



《货币崛起》

尼尔·弗格森著 中信出版社 二〇〇九年六月



《中国式饭局》

高和著 作家出版社 二〇〇九年五月



《廉价哲学》

洪晃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二〇〇九年五月

特别关注

孙皓晖谈《大秦帝国》：

推崇伟大时代是学人良知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

作家孙皓晖潜心海南16年创作的《大秦帝国》，被评论界称做“为原生态中国立传”。众多评论家惊讶于《大秦帝国》的恢宏气势，著名历史地理学者史念海先生说：“《大秦帝国》选了一段最壮烈的历史。写得很周到，很细，也很感人。《大秦帝国》是非常具有历史真实感的一部作品。”

这部巨著共6部11卷，500余万字，展现了秦国崛起，兴盛，建立统一帝国又倏忽崩溃的历史。描绘了近200年的战国风云与帝国生灭，充分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，经济，文化，军事等各方面。

如此巨著，难怪有人惊呼《大秦帝国》是气势宏大的帝国史诗。数量和规模是个难度，但真正的难度是它的题材。先秦史料相对简单且真伪难辨，诸子百家著作博大精深但又必须有充分的阅读和了解，在此基础上再剪裁布局，理出框架，谈何容易！

《大秦帝国》的一个更重要特点就是：作者对战国历史精神把握得非常准确，有着旗帜鲜明的历史观。此历史精神贯穿全书，形成了《大秦帝国》激情澎湃，昂扬向上的作品风格。

近日，这部热销中引来争议的长篇巨著，各种不同的声音接踵而来，史学界、读书界以及“大秦迷”高度关注，也让一般读者乱眼迷离。

Q&A

孙皓晖答《海南周刊》记者问

坦然面对质疑声

海南周刊：《大秦帝国》自出版之日起就备受关注，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作品研讨会汇聚了一大批专家，赞扬之声成为主流，批评之声也显尖锐。对此，您有何看法？

孙皓晖：我说过，一部作品一旦完成，它就是独立于作者之外的客体，去接受社会所有层面的解读；作者的自我解析，也未必比读者们准确深刻。所以，任何肯定，任何批评，我都是坦然的。我愿意与读者们一起欣赏《大秦帝国》，欣赏那个时代，也愿意与读者们一起分析批评《大秦帝国》，分析批评那个时代的缺陷面。

海南周刊：评论家谢有顺对您作品中的人物刻画满怀赞誉之词，认为您让商鞅、蒙恬、秦始皇、李斯、赵高等一大批人物有血有肉地站起来；而另一种批评则认为，书中的人物呈扁平化，过于拔高了商鞅等人物，以及表现出英雄主义雷同等问题。您是怎么看的？

孙皓晖：对于这种批评，我认为有两种原因。一种是批评者不了解那个时代，对那个时代误解过甚，我们已经很难解读那个时代了，已经不相信那个时代的普遍精神了。另一种原因，可能是我自己对某些遭受长期歪曲的人物，譬如商鞅和秦始皇，缺陷面没有正面地、深入地去写，而只写出了人物发展的逻辑性，使一些读者误认为这些人物是完人。

司马迁对历史上为国家负责的人物的悲剧牺牲，对民众在保卫国家、反击外患战争中付出的牺牲，都给予了淡漠，给予了批评；

潜心海南16年，笑称在海岛制作“深水炸弹”的作家孙皓晖，其鸿篇巨制《大秦帝国》出版后，备受各方关注。在不久前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，专家、学者对该书赞扬之声不绝于耳。然而，不同的声音也并未止息。近日，一直跟踪报道《大秦帝国》创作及出版情况的海南日报记者，拨通了孙皓晖在西安老家的电话，孙教授就海南日报记者的提问做了详细解答。



孙皓晖近影



《大秦帝国》孙皓晖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

而对所有明哲保身、全身自保、不对国家民族承担应有的职业责任的人物，都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肯定。莫非这就是我们某些人要求的历史观？

长期以来，我们的文学艺术，对生命之美的艺术发掘已经丧失了能力，对那些文明史上曾经迸发的无比灿烂的生命之花，只从阴暗的、悲剧的方面去解读，我没有这样做，而且，永远也不会这样做。

不能贬低自己的文明圣地

海南周刊：有意见认为，由于您对大秦精神无尚推崇，在叙述历史事件、评价历史人物时，主观色彩过于浓重了，以致于更改了一些历史事实，如把商鞅之死改为慷慨就义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带来的深层次的思索。是这样吗？

孙皓晖：中国的历史烟雾，太深重了。《大秦帝国》将春秋、战国、秦帝国时代的历史，正面地呈现出来，许多人不相信，批评我主观色彩浓重，是完全正常的。但是，历史终将证明，对那个时代曲解的，不是我，不是《大秦帝国》，而是已经被卑俗化了的后世理念。

帝国时代的伟大，和我的推崇没有关系。如果，一个人能将一个卑俗的时代“写”成伟大的时代，那是连天方夜谭里也不会有事。推崇一个伟大的时代，是一个学人的文明良知，更是一个民族的文明良知。拼命地贬低，拼命地糟蹋自己的文明圣地，在全世界的文明史上，只有我们中国人干得出来！

商鞅的慷慨就义，符合历史逻辑，也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，更符合商鞅的信念逻辑。商鞅“造反被杀”之说，史料记述完全经不起推敲，实在没有理由相信这种说法的历史真实性。所谓护法而死就“削弱了人物悲剧命运带来的深层次思考”，我认为恰恰相反。变法领袖因变法成功而死，这是中国政治文明最深刻的悲剧，它所隐藏的社会前进的残酷性，不比“造反被杀”的简单的浅层政治逻辑深厚吗？

希望引发对文明正源的思索

海南周刊：《大秦帝国》同名电视剧在台湾受到热烈的追捧，网络下载页很火爆。能谈谈这方面最新的情况吗？

孙皓晖：台湾已经在第三次重播《大秦帝国》了。台湾一个编剧，曾在我的博客留言，说台湾影视圈都在议论《大秦帝国》，觉得大陆能拍出这样震撼人的作品，实在应该多交流，多学习。这位先生还说，有机会一定邀请我去台湾交流。我当然乐于接受。对于一部展现统一文明的作品，台湾同胞能如此共鸣，我是深感欣慰的。

美国华人世界的反响也很强烈。有几个留学生给我发邮件，写文章，谈观后感，都很振奋。英语世界反响如何，现在还没有直接反馈。韩国正在播放，日本也即将播放，据说都有一定的社会期望值。

今年12月中旬，国内的四家卫视（陕西、福建、河北、河南）也将同时播放《大秦帝国》，希望能引起人们对我们的民族文明正源的普遍思索。

质疑声音

质疑声一：缺乏悲悯情怀

“中国的旧小说中，普遍缺乏一种悲悯的精神，当我读《大秦》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。看其中的商鞅变法，我没有读到小说对那么多被处决的平民施以任何怜悯或同情，反而津津乐道于渭水河边的那次行刑，被处决的犯人在临死前幡然悔悟，把自己作为反面教材，警醒自己的家人不要再蹈覆辙。牺牲者反倒是对屠夫大声叫好，心甘情愿地引颈就戮，岂非咄咄怪事！我无意于否定商鞅变法的进步意义，也并非迂腐到反对一切暴力。但我希望，即使商鞅是绝对正确的，即使变法中的流血牺牲是无可避免的，至少小说能适当照顾一下读者的审美感受，给我们留下一点人文关怀，在《大秦》的世界中，除了冷冰冰的律法外，多少给读者留下一点悲天悯人的情怀，还有对生命的尊重。” ——江湖夜雨不眠灯

质疑声二：硬伤错误

细心的网友往往会发现有些配角乃至配角中的配角要么交待不清，要么“死而复生”。“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几个死而复生的，比如于兰死后又出现了。类似的还有剧辛、肥义、司马尚。再就是关于出身，比如说嬴豹是公子虔的孙子，但第三部开始公子虔的两个儿子图谋失败身死，不知嬴豹是谁的儿子，怎么还能做领兵大将。还有几个次要人物前后不一致，一时想不起来了。” ——中国图书商报

质疑声三：主观色彩过浓

“我对于这部书的有些写法是明确持不赞成态度的，作者在重述历史中主观化色彩过于浓重，以至于在情节处理上不惜改变某些基本史实，如把商鞅之死改为慷慨就义，就过份了，难以为现代读者接受。大可不必这么写，即使可以，也只有一种前提，那就是充分的小说化，使人物性格的逻辑力量和感染力量强大到足以溢出史实，像《三国演义》做到的那样，可是那就太难了。” ——胡平